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3.021

# 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策略： 《醒世恒言》“心”字译法探析

张星, 王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要求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关注, 必然会带动中国典籍英译的发展。文章以2011年由杨曙辉和杨韵琴夫妇合译的冯梦龙《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的译法为考察对象, 使用文本案例分析与文本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较好地诠释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从而为中国典籍英译的最佳实践提供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翻译策略; 充分性翻译; 译者主体性; 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1)03-0162-07

“对西方而言, 20世纪就是翻译的世纪。20世纪西方翻译的发展和繁荣,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繁荣是因为出现了翻译的两大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和三大根本性突破<sup>①</sup>。很明显, 自20世纪以来, 翻译研究已经打破以往经验性层面关于“如何译”的探索和总结, 开始走向以理论构建为目的的全面性思考阶段, 并将翻译放入更为宏观的文化语境中去考虑。

汉语文化中的“心”字是汉语中的一个文化关键词, “心”不仅是人体重要器官, 而且其引申意义对于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从“心”字的演变历史以及心族字的大量涌现可以看出, 在中国古汉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心”字无疑是窥探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 也是中国社会演变的缩影, 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sup>②</sup>。同时, 在中国传统文化奠基性作品“四书五经”中也大量出现“心”字, 学者对此也有相关研究<sup>③④</sup>。如此, 了解“心”字的用法, 便可以由此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翻译实

践中, 汉语“心”字的译词选择要根据语境进行辨别, 并不能与英语中的“heart”一词完全对应。通过对“心”字这个文化负载词译法的探析, 也许可以窥探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作品如何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在全球化语境下,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逐渐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中国典籍英译是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sup>⑤</sup>。因此, 本文选择从《醒世恒言》全译本中“心”字的译法开始探究传统文化传播下的典籍翻译策略及其功能价值, 试图探寻译者在典籍翻译过程中采取哪种策略以及这种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该译本由美国贝茨大学教授杨曙辉与联合国秘书处同声翻译杨韵琴女士共同完成, 由岳麓书社于2011年出版, 是《醒世恒言》首次英文全译本。《醒世恒言》是冯梦龙的著名通俗白话小说集“三言”的最后一部。

通过搜索“醒世恒言”与“翻译”两个关键词, 得到19条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其中只有一篇是对

收稿日期: 2021-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YY103)

作者简介: 张星(1984—), 女, 湖南衡阳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口笔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技术、认知翻译研究。

①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②李骊明:《从心族字的语义演变看中国父权文化的确立过程》,《古文字研究》1996年第5期。

③王珏:《情感、思想与性格:〈诗经〉中“心”字的含义与主体人称关系论析》,《枣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④黄效:《论“心”字在〈孟子〉中大量出现——兼与戴兆国先生商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

⑤汪信砚:《中国文化走出去:意涵、目的和路径》,《江淮论坛》2020年第3期。

单个字词“寸”的翻译策略研究,采用的是文本案例分析方法。在《醒世恒言》译本研究中,尚无对“心”字译法的研究成果,也没有采用文本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

## 一 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翻译的“等值”问题一直是西方世界的研究重点,无论是早期俄国学派对于形式对等的语言学探索,还是法国释意派理论中将脱离语言外壳的意义对等作为实现翻译功能的判断标准,都是学界在探寻最佳翻译策略与实践技巧上的各种尝试。这种尝试一直围绕着“等值”二字逐渐开展,事实上,这个“值”的定义在不同学派之间存在着争论,到底是语言文字层面的价值还是社会文化功能的体现,不同学派因此产生风格迥异的翻译理论。其中,法国学派将翻译中的字词对应与意义对等进行区分,首次将语篇作为翻译单位带入研究者的视野<sup>①</sup>。

在莫娜贝克看来,语义由直接意义和间接意义构成,是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概念<sup>②</sup>。这与语言学界对于语义的传统诠释不谋而合,即语义是语言形式和语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全部意义。间接意义是指超出字面意思的文本意义,一般由译者通过对原文意思的解读从而传达作者的原意。因此,译者毫无疑问地介入译文文本产出的过程,并对译文文本风格和语言特点甚至语义传递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正如赫曼的“话语呈现”所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作者源语信息所做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决策,最终形成了译语综合产物,这个最终产物体现了译语文本中的语言选择,这就是译者介入翻译过程的机制,也是译者印记在译文中的体现<sup>③</sup>。因此,与源语文本完全对应的译语文本几乎是不存在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译者往往会放弃形式对等,甚至对语义进行修改,从而实现源语文本的某些功能性目的<sup>④</sup>。

许多学者都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沟通方式,译文本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性目的,这是翻译的文化属性。翻译过程中有多种参与者都对译文生产造成影响,而这其中的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行为”是跨文化沟通中译者的目的性行为。无论是莱斯和弗米尔的目的论,还是曼塔利的译行为模式,又或是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都对译文的功能目的以及与译者的关系进行阐述,其核心思想紧紧围绕着如何实现译文的功能与目的。曾霞指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在文本翻译策略上都主张打破语言学派的等值原则,给予译者对文本的介入与操控权力,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和功能<sup>⑤</sup>。正如曼塔利所说,翻译不仅仅是对字词、语句、语篇的双语转换,任何时候,翻译都是跨越文化隔阂、引导文化融通的一种实践,目的是实现有效沟通<sup>⑥</sup>,这也是功能学派和文化学派共同认可的翻译策略。简言之,翻译的目标就是引导译入语读者认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实现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跨文化沟通,而译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决策者这一重要角色<sup>⑦</sup>。

那么,翻译又是如何实现跨文化沟通的呢?图瑞认为,“首先要认清,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的社会系统和文学系统中占据着某种地位”<sup>⑧</sup>,这个地位决定着翻译作品发挥的功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具体来说,如果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占据首要地位,译者更乐意打破目的语限制,保留源语语言特征和文学传统,这种翻译被图瑞称为充分性翻译;相反,如果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译者则会受限于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不得不将满足目的语读者偏好作为翻译的首要考虑因素,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译文就是图瑞所谓的可接受性翻译<sup>⑨</sup>。换言之,翻译作品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地位制约着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

①Marianne Lederer. *La Traduction Aujourd' hui: le Modèle Interprétatif*. Paris: Hachette, 1994.

②Baker, M. and K. Malmkjær (eds).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st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207-208.

③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98.

④Baker, M. and K. Malmkjær (eds).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st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4-6.

⑤曾霞:《翻译中的操纵行为——功能学派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共同之处》,《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⑥Justa Holz-Mänttari. *Translator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84, pp.7-8.

⑦石春让:《重释小畑薰良的“海变”译论——中国文化外译的新视角》,《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期。

⑧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175.

⑨阮宏芳:《可接受性和充分性——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池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翻译决策过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跨文化沟通是目的,翻译决策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二是文化地位是制约因素,翻译决策离不开对这个因素的客观判断;三是译者是实际决策者,其决策行为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翻译决策结果形成最终的翻译文本,而通过对翻译文本的分析可以总结出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

综上,翻译决策过程体现的是译者的意志性行为,这正是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核心思想:“把翻译活动操纵者的意志性纳入研究视野……充分考虑译者的意志性、翻译的社会性和译文生存空间的复杂性。”<sup>①</sup>周领顺通过引入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三要素构建评价译者行为的连续统,观察并跟踪此概念系统的动态变化,就可以对译者的行为以及译文的质量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估<sup>②</sup>。周领顺认为“求真”是译者的语言性,是作为“译者”这个角色的译内行为——翻译之本;而“务实”是译者的社会性,是作为“社会人”的译外行为——翻译之用。那么,结合译内效果(文本价值)与译外效果(社会功能)进行双向评价,是翻译批评的正确途径。本文循着这个思路,从译者的语言选择出发,结合译者所处社会环境与历史阶段,对译者行为及其目的进行探析。

在研究方法论上,本文采用图瑞提出的三段式方法论:第一,将译本放在目的语文化中考察,确定其重要性和接受程度;第二,对照原文和译文中的耦合对子,做文本分析,找出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转移,并概括这些译法背后的翻译策略和规范;第三,找出可以复制的翻译经验,以指导日后的翻译决策<sup>③</sup>。这里,图瑞强调文本分析的重要性,是研究翻译策略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主要路径。

## 二 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文化本身是一种软实力,因国家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不是强加于受众的,而是由于文化本质上具有的某种吸引力可以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选择

主动接受并学习这种文化。决定文化吸引力大小的因素中,既有其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活力,也有文化传播体系与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等外部因素,如何将先进价值观打造成为可对外输出的文化精品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促进各国间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途径<sup>④</sup>,而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这个传播手段,译什么、怎么译决定了翻译产品的文化吸引力,同时也对源语与译语的文化地位产生一定干扰<sup>⑤</sup>。由此可见,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直接关系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也有利于促进源语与译语文化的互利共生。

国内已有不少文献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对翻译策略进行研究,由此,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徐广东将基督教核心术语“公义”与汉语中的“义”进行语义内涵对比,结合汉英文化语境的不同之处,阐述翻译此类文化负载词的三步法:“格义”“别赋新义”“转外音为熟语”<sup>⑥</sup>。很明显,这里探讨的是在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时的翻译策略,也是探析翻译策略在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时发挥何种作用。相反,耿玉聪通过对《长恨歌》英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不同应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进退取舍全在于译者,减少文化冲突还是再现原文风格,离不开译者对于双语文化的理解与把握<sup>⑦</sup>。大多数情况下,当译语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译者更倾向于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减少对异族文化的冲击,让译文更易于被读者接受;当源语文化不弱于译语文化时,译者的文化自信会体现在译语文本中,具体表现为保留特定文化词汇,主动传播浓厚的异国情调,从而积极再现源语文本的风格。这样的翻译策略选择,完全符合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无论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处在一种互惠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两者通过相互学习、彼此借鉴来获得一些新的认知,要么为发展自身不断汲取异质文化中的营养,要么为壮大自身积极传播本族文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接触与采借过程中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sup>⑧</sup>。

①周领顺,赵国月:《译者行为批评的战略性的》,《上海翻译》2015年第4期。

②Binghui Li.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Ten Yea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2020(1):24.

③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④王春林:《提升中国文化对外吸引力的策略和途径》,《学术论坛》2015年第9期。

⑤朱月娥:《文化生态中翻译的中度干扰》,《中国科技翻译》2013年第1期。

⑥徐广东:《跨文化传播中术语翻译策略解析——以“公义”释义为例》,《外语学刊》2019年第3期。

⑦耿玉聪:《古诗英译中归化和异化倾向与文化传播——以〈长恨歌〉英译本为例》,《教育教学论坛》2017年第27期。

⑧朱月娥:《文化生态中翻译的中度干扰》,《中国科技翻译》2013年第1期。

正如秦文华指出,在语言、文本转换的同时,异质文化之间也随之互证、互补、互指起来<sup>①</sup>,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变动不居、互涉互融的,译出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存在的“互文性景观”正是译者创造和赋予源语或译语文字新的意义的可行性基础,也正是这样创新性的赋义行为使得异质文化之间获得一种关联与沟通。从字词的变迁到文化的链接,翻译便是在这样一个双语转换过程中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分享与传播。

综上,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关系。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实现特定文化传播目的的途径,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又反过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当今的信息化时代需求,决定作为文化消费品之一的翻译作品必然承载一定的文化价值,其传播过程不再是被动、单向的,而是由译作产出国与消费国双向选择之后产生的一个主动传播的过程。那么,作品外译时必然会考虑到文化传播的因素,并在翻译策略上进行相应的抉择;反过来,也不可否认,任何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必定带着某种文化传播的目的性。无论是用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语言文字将陌生文化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还是保留源语特色、故意引起文化不适从而达到培养海外受众的“文化瘾”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讲好源语文本故事,让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和共鸣。

### 三 “心”字的英汉语义差异

研究双语文本中“心”字的对应关系,首先需要厘清英汉两种语言中“心”字的义项,即“心”字在英汉语言中的不同语义和用法。关于汉语中的“心”字与英语中的“heart”一词的语义与用法,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做了对比研究,其中包括 Niemeier、Bartolomeo、侯玲文、王文斌、齐振海、卢卫中、张建理、Jing Li 等。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汉语文化中“心”字的含义远比英语中“heart”一词的含义更为丰富多样。

具体说来,张建理<sup>②</sup>在文章中总结出“心”字在汉语里的三类义项,即思维义、情感义和实体义。实际上,Jing Li 等通过自然语义元语言(NSM)分析方法对汉语“心”字的义项进行详尽的梳理,研究发现“汉语文化中‘心’字的含义囊括 Wierzbicka 对英语中 heart 一词的全部释义”<sup>③</sup>。Jing Li 等进一步将汉语“心”字的意思归为 8 个大类,通过“心”字的解析揭示独特的中国文化,这 8 类义项分别是:心与情绪;心与脏器;心与心智;心、德行与视野;思维认知的心;心与专注;心与欲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心<sup>④</sup>。

从以上提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国汉语“心”字的意义因受到中国文化特有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其概念包含情感与思维等多重意义,是“身心合一”的体现。相反,西方哲学家则认为心与身是二元对立的关系,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第一次将身心关系的论述引入哲学领域。因而,英语世界的“heart”一词是人体的器官,是人类情感体验的感知器,用以表达人类的情绪。

很明显,汉语“心”字与英语“heart”一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心”字的概念内涵远远大于“heart”一词。如果能让译语读者准确理解源语文本,在中译英转换的时候必然要区分源语中“心”字的概念所指,不可完全用英语“heart”一词进行替换。同时,关于“心”字的概念我们不能只关注字词训诂,还要关注经学训诂<sup>⑤</sup>。

### 四 《醒世恒言》中“心”字译法的统计分析

基于以上对于汉语“心”字与英语“heart”一词的差异分析,本文选取《醒世恒言》全译本作为分析文本,找出译本中出现的“心”字译法,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意图挖掘译者在选择译词时的深度考量,也尝试着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剖析。

为何要选择《醒世恒言》全译本,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①秦文华:《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外国语》2002年第2期。

②张建理:《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与隐喻》,《修辞学习》2005年第1期。

③Jing Li, Christer Ericsson, Mikael Quennerstedt.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keyword xin”, *Journa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2013(5): 75-89.

④Jing Li, Christer Ericsson, Mikael Quennerstedt.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keyword xin”, *Journa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2013(5): 75-89.

⑤冯胜利:《训诂的属类与体系——论经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的独立性》,《古汉语研究》2019年第3期。

一是《醒世恒言》作为“三言”之一,开创中国小说新局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小说集,在描写手法与情节词汇等方面都超越了宋元旧作,其中的生活场景多样化、情感思想细腻化程度足以反映出当时市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也体现当时社会市民的情感和思想。这样的一部作品非常适合用于分析翻译策略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二是本文选择的这个译本,是《醒世恒言》的首个双语全译本,译者不仅完整地展现原版中文小说集,在翻译时也是做到不漏译不错译,是迄今为止该小说集译本中最为准确生动且可读性极强的作品。华盛顿大学知名中国文学教授 Robert E Hegel 在该译本的序言中称:“他们的译本可以与任何时期的中国小说最佳英译本相媲美。”该译本按照原作中故事的顺序将原文毫无遗漏地翻译成英文,包括原版中的眉批也保留下来,具有极强的文本价值。

三是本文选取“心”字译法作为探析翻译策略的进路,那么便需要文本中能找到丰富的“心”字用法。《醒世恒言》作为一部人物丰富、情节生动的白话小说集,富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特征,必然会采用许多关于“心”字的表述,这就符合本文的研究思路。另外,《醒世恒言》中一共收集 40 个故事,文本的长度也很适当,值得研究。

为了对“心”字译法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首先需要在译本中找出原文中出现“心”字的地方,并将原词与译词挑出来进行整理,建立译词对应表,如是才可一目了然体现“心”字的译法。查找原文时,下载《醒世恒言》的中文原版电子书,通过全文搜索“心”字,找到其出现的位置,再按图索骥到纸质双语译本中相应位置找出对应的译词。目前,暂无法获得双语译本的电子版文件,只能通过以上方式查找。因文章篇幅有限,只对《醒世恒言》第一卷(全书共五卷)进行耐心细致的文本搜索和分类整理工作,获得 282 条“心”字记录,并将原词、译词、原词义项类别(按情感义、思维义、实体义分为三类)、所属故事名称、出现页码等信息整理为详细的译词对应表(因表格太长,不在本文内呈现)。通过译词对应表可以看出,“心”字在《醒世恒言》第一卷中 8 个故事 100 多页文本中一共出现 282 次,平均每一页“心”字会出现 2 到 3 次,这样的出现频率表示“心”字是贯穿故事始终的关键词。这里,“心”字的译法主要分为五种策略:(1)字译,即将“心”字译为对应

的英文词,例如 heart, mind, thought 等词;(2)合译,即“心”字与其前后字词构成译语中新的语义单元,那么便不再单独翻译“心”字,而是对新词进行整合翻译,例如:疑心、耐心等词;(3)意译,即根据语义将“心”字所在短语或短句译出,不再使用“心”字的本义,不进行逐字翻译,例如:“留心”翻译为 keep her eyes open for;(4)不译,即在保证不影响语义完整度的情况下不将“心”字译出,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前后与其搭配的词汇意义更为显著,从而不需要将“心”字意义单独表达出来,例如:“心里想到”只需要译出“想到”一词;(5)整句未译,即译文中没有翻译“心”字所在句子,这种情况出现 3 次,可能是译者的漏译或者删译行为,可以不计入译词统计结果。

基于译词对应表,本文进一步按照词组搭配类型将源文中“心”字词汇进行归类,一共整理出 95 类“心”字词汇,例如“心上”“心下”“心中”“之心”等类型。通过 Stata 计量分析工具,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分别检验出现频次超过 10 次的“心”字词汇类型通过义项类别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见表 1 和表 2)以及词汇类型直接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见表 3)。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在 6 类“心”字词汇中,“心下”与“心中”类词汇更多表现为情感义,而“放心”类词汇则更多表达思维义;与此同时,情感义的“心”字词汇在翻译策略选择时以不译为主,而思维义的“心”字词汇则更多采用合译的翻译策略。表 3 中的结果显示,“心下”与“心中”类词汇主要采用不译的翻译策略,而翻译“放心”类词汇时则以合译方法为主。显然,表 1、表 2 与表 3 中的结果是相互吻合的,这就说明:(1)在典籍翻译中出现“心下”与“心中”类词汇时,译者采取不译的策略是可取的。事实上,“心下”与“心中”在文本中时常与表示情感的词汇搭配出现,比如“心下欢喜”“心中大怒”等。这种情况,译者会直接将情感词汇译出,而无需赘述感知情感的“心”这一器官,“心”字的意义已是一个默认的事实,译与不译并不对目标语含义造成影响。此种情况下选择不译的策略是最为便捷有效的。(2)结果显示,翻译“放心”一词时,应采用合译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与“放心”一词相关的词义在目标语中可以找到对应词汇进行表达,在本研究的译词对应表中主要译为 assured、feel easy 和 worried(不放心)。其中,也出现 2 次,译者用直译的方法将“心”字译出,“放心”译成:put his mind at rest/at ease。

表 1 “心”字词汇类型通过义项类别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字译	合译	意译	不译	整句未译
情感义	-0.12* (0.27)	-0.17** (0.05)	-0.07 (0.00)	0.27** (0.25)	0.06 (0.00)
思维义	0.07 (0.30)	0.19** (0.25)	0.08 (0.00)	-0.23** (0.21)	-0.06 (0.00)
实体义	0.2** (0.84)	-0.06 (0.00)	-0.03 (0.30)	-0.11 (0.61)	-0.01 (0.07)

注:表格中为相关系数,括弧中为 P 值。带\*号为显著相关系数。

表 2 “心”字词汇的义项类型分布

	情感义	思维义	实体义
有心	-0.1 (0.11)	0.1 (0.09)	-0.02 (0.72)
心上	0.01 (0.82)	-0.05 (0.43)	0.14* (0.02)
之心	0 (0.99)	0.01 (0.91)	-0.02 (0.69)
心下	0.13* (0.03)	-0.11* (0.05)	-0.04 (0.46)
心中	0.18** (0.00)	-0.16** (0.00)	-0.07 (0.26)
放心	-0.12* (0.04)	0.12* (0.04)	-0.02 (0.75)

注:表格中为相关系数,括弧中为 P 值。带\*号为显著相关系数。

表 3 “心”字词汇类型对翻译策略选择的直接影响

	字译	合译	意译	不译	整句未译
有心	0.02 (0.68)	0.06 (0.35)	0.12* (0.04)	-0.12* (0.04)	-0.02 (0.75)
心上	0.01 (0.85)	-0.05 (0.39)	0.03 (0.59)	0.02 (0.73)	-0.02 (0.74)
之心	0.04 (0.49)	-0.1 (0.08)	-0.05 (0.39)	0.08 (0.20)	-0.02 (0.73)
心下	-0.1 (0.08)	-0.19** (0.00)	-0.09 (0.12)	0.3** (0.00)	-0.04 (0.52)
心中	-0.1 (0.08)	-0.29** (0.00)	-0.11 (0.07)	0.38** (0.00)	0.02 (0.71)
放心	0 (0.94)	0.2** (0.00)	-0.04 (0.50)	-0.14* (0.02)	-0.02 (0.78)

注:表格中为相关系数,括弧中为 P 值。带\*号为显著相关系数。

另外,通过表 1 和表 2 中不同类别义项的“心”字的翻译策略显著性结果可以看出,实体义的“心”字一般采用字译的方法,情感义的“心”字

不常采用字译方法,而思维义的“心”字在字译方法上不显著。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统计结果,接下来将对“字译”情况进行深度分析。首先,“字译”情况一共出现 77 次,对应的译词及出现频次见表 4。

表 4 采用字译方法的“心”字译词与义项类别分布

序号	译词	出现频次	义项类别
1	heart	24	情感义(15次)
			思维义(6次)
			实体义(3次)
2	feel	10	情感义(5次)
			思维义(5次)
3	mind	20	思维义
4	thought	9	思维义
5	intention	3	思维义
6	purpose	3	思维义
7	sense	2	思维义
8	mid-	1	实体义
9	character/moral/wish/fancy	1	思维义
10	inwardly	1	情感义

由表 4 结果可知,对“心”字进行字译时,可对应不同的译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heart 一词,随后是 mind, feel, thought 等词。很明显,汉语“心”字的意思是丰富多样的,在“心脏”本义之外,还可以表达与心脏有关的情感与感受,同时也是大脑思考功能的代名词。实际上,这里的思维义译词出现 52 次,情感义译词出现 21 次,实体义译词出现 4 次。译者显然知晓“心”字翻译时需要注意区别语义,“心”与 heart 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可有趣的是,即使在译者对“心”与 heart 区别了然于胸的前提下,译者依然采用 heart 一词来表达实体义、情感义和思维义等多种语义。在英语中与 heart 一词相关的表达都是实体义和情感义,只有在汉语中“心”字可以表达思维义,汉语中的“心”字兼具“心脏”与“大脑”的功能,中国文化中的“心”统领着人的身体,对各个器官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表 4 的数据表明,用于表达情感义和实体义的 heart 一共出现 18 次,比表达思维义的出现频率高,这完全符合英语 heart 一词的常见用法;而用于表达思维义的 heart 也有 6 处,这是译者将汉语“心”字的用法转移到英语 heart 一词上,属于上文中徐广东提到的“别赋新义”的手法,也像是图瑞所说的保留源语语言特征和文

学传统的充分性翻译策略<sup>①②</sup>。总之,在目的语中使用具有源语语义的译词,更像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译行为”,这种翻译操作使得选用的译语词汇在译文中显得格格外“与众不同并且会引起译语读者的关注”<sup>③</sup>。这也与 Vinay and Darbelnet 提出的翻译中存在受限和选择的说法一致<sup>④</sup>,在译语词汇的自由选择中逐渐显现出译者的风格,而这就是“译者印记”。通过对“心”字译法的探析,本文发现《醒世恒言》译本中的“译者印记”,那就是,译者将汉语“心”字的概念意义附着到英语 heart 一词上,塑造一个打破目的语语言规范的新词 heart,从而将中国语境和传统文化概念移植到英语语言与文化中,这将会使得译语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及传统文化产生好奇与兴趣。

###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译法的分析,发现译者带有目的性的“译行为”,这可能是译者为了实现跨文化沟通所采用的一种翻译策略,是钱钟书所言林纾式的“明知故犯”,而不是译者疏于辨别“心”与 heart 的差别而产生的语言错误。2020年,联合国宣布汉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之一,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强大的体现,也意味

着中国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这必将影响我国文学作品外译的目的和策略。那么,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需要呢?图瑞的三段式方法论指出,要在文本分析中找出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转移,概括出这些译法背后的翻译策略,总结可复制的翻译经验<sup>⑤</sup>。按照这个方法,可以说《醒世恒言》译本中“心”字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的转移方式是源语语义在目的语土壤上的扩展、延伸甚至是新生,是译者主动传递中国特色文化的一次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译者是期待着译语读者对中国话语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好奇。换言之,通过译词语义的延展将源语文化介绍给译语读者,正是本文研究的译本中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是充分性翻译的一种,旨在达到跨文化沟通的目的。事实上,跨文化沟通就是一种主动性行为。不破不立,勇于打破目的语限制,才能将源语文化更好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sup>⑥</sup>。那么,当代中国在跨文化沟通目的下的典籍英译最佳策略便是合理采用充分性翻译策略,适当保留源语语言规范和文学传统,引起目的语读者对新语言现象的好奇心,从而激发读者探索源语文化的欲望,这样才能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功能。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Xin* in the Translated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ZHANG Xing & WANG Jian-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ttention paid by western world to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its cultural values will certainly bring for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translating of Chinese classics, this paper tries to undertake a textu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by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T word *Xin* in the 2011 translation by Professor Yang Shuhui and Ms. Yang Yunqin of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compiled by Feng Menglong, aiming to identify the translators’ conscious lexical choices and the effects of such subjective ac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rategy; adequate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徐广东:《跨文化传播中术语翻译策略解析——以“公义”释义为例》,《外语学刊》2019年第3期。

②阮宏芳:《可接受性和充分性——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池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99.

④毛文俊,付明端:《操纵理论视阈下的葛浩文翻译策略研究——以葛译莫言小说为例》,《外文研究》2018年第1期。

⑤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⑥张星,王建华:《意识研究视域下中国机器翻译产业发展的探源性分析》,《科学决策》2019年第12期。